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政治观念史稿·卷六

刘小枫 ● 主编




沃格林(E.Voegelin) ● 著

革命与新科学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VI
Revolution and the New Science

谢华育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

刘小枫 ● 主编



革命与新科学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VI
Revolution and the New Science

沃格林 (E. Voegelin) ● 著

谢华育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观念史稿. 第6卷: 革命与新科学 / (美) 沃格林(Voegelin, E.)
著; 谢华育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17-6686-6
I. 政… II. ①沃…②谢… III. 政治思想史—世界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6006号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VI) : Revolution and the New Science

By Eric Voegelin

Edi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arry Cooper

Copyright © 1998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051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政治观念史稿(第六卷): 革命与新科学

(美)沃格林 著

谢华育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9.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686-6/B · 495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文版出版说明

·出生在德国古城科隆的沃格林(1901—1984),上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长大后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攻读的是政治学博士,沃格林喜欢的却是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教授,心目中的偶像则是自由主义思想泰斗韦伯。不过,尽管沃格林后来荣幸地成了凯尔森的助教,却不像一般的自由主义学人那么不开窍。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比施特劳斯早十年拿到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走了一圈,回国后即着手教授资格论文……纳粹掌控奥地利,阻断了沃格林在德语学界的学术前程。1938年,沃格林流亡美国,次年便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为大学生撰写一部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简明教科书——于是,沃格林便着手撰写一部《政治观念史》……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的“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还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

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这部《政治观念史》终于没有正式完成,变成了一堆“史稿”,如今英文版编者对将这些“史稿”整理编辑出版仍然感到不安:沃格林生前毕竟废置了这部“史稿”。

废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非仅仅是“卷帙过大”，远远超出“两百页”的预定规划，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不合什么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却打破这种现代式的学术规范，哲学、文学、史学、宗教、政治、经济思想一锅煮……让如今的大学教授如何找到自己的专业？仅就这一点来说，整理编辑出版这部“史稿”，对西方学界已经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

翻检一下近百年来我国学界翻译出版的西方“史书”便不难发现，形形色色的哲学史书翻译得最多，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史方面的书就翻译得少得多，史学史、宗教史更等而下之。如此哲学偏好使得我们的大学不断培养出哲学迷狂——然而，仅仅从形而上学史来看待西方思想史，而将文学、史学、宗教要著排除在外，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畸形的西方思想史形象。

沃格林觉得，即便要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他的这部《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废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在于，沃格林以思想史的方式来展开自己对现代性的探问时思想发生转变，下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象征”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才更为根本。

沃格林重起炉灶，把“史稿”中的材料大量用于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以及其他重要文集——如今我们看到的《政治观念史稿》从“希腊化时期”开始，不免感到奇怪，其实，此前的材料都变成了《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由此看

来,要追溯沃格林究竟如何探究现代性危机的来龙去脉,这部废置的“史稿”仍然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

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是我国学界和大学教育的世纪性根本课题之一,且迫在眉睫……提出“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让国朝学界好些少壮学人无名火起:凭什么你才知道真正的西方传统,我们知道的就不是!……的确,要让自己把从前学的那套思想观念谱系置换掉,谁也不舒服。然而,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来的启蒙传统观念?——施特劳斯说得好: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

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就得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就此而言,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将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诸多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废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十年前,当我读到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第一卷时,便起心要组译这部八卷本的大部头“史稿”——当时在香港供职,因部头太大,选题被否。如今,在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承担组译的北京大学政治思想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下,八卷本“史稿”的翻译终于落实,谨此向诸位译者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一些常见的西方思想史上的术语的译法,尽管已经通行,其实并不恰切,乘我们重新认识西方传统之际,该作订正的最好赶紧订正,因此:“斯多葛”改作“廊下派”、“末世论”改作“终末论”、“诺斯替”改作“灵知派”……等等,特此说明。

刘小枫

2007年7月于沐猴而冠斋

目 录

中文版出版说明(刘小枫) / 1

英文版编者导言 / 1

第六部分 革命

第一章 离经叛教 / 31

一、重述基督教的时代 / 31

二、博舒埃与伏尔泰 / 35

三、历史意义的重构 / 41

四、基督教与内在尘世问题的延续性 / 46

五、世俗化的动力 / 55

六、伏尔泰的攻击 / 61

第二章 分裂的民族 / 79

一、理性的真空 / 79

二、引发争议的地域观念 / 81

三、分裂的小世界 / 82

四、闭合过程的时间结构 / 87

第三章 维柯:《新科学》 / 91

一、意大利的政治 / 91

二、维柯的著作 / 95

三、新科学的观念 / 103

四、沉思的步骤 / 107

五、西方观念的延续体 / 115

六、自然的模式 / 117

七、市民的世界 / 124

八、演归进程与复归 / 132

九、永恒观念的历史 / 144

十、共同意识 / 152

十一、进程的政治结构 / 159

十二、结论 / 167

第四章 英国对具体的探索 / 172

一、典型的政体 / 174

二、对具体的丧失 / 190

三、绝对空间和相对性 / 216

英汉对照索引 / 256

译后记 / 281

附录:《政治观念史稿》(1—8卷)总目录 / 287

英文版编者导言

在撰写本卷《政治观念史》的过程中，沃格林遇到了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在他讨论之前的历史时期中那些政治事件和政治观念时，这些问题被他回避了，或者只是间接做了些处理。沃格林对“材料”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今天被我们称为历史性的问题，正是《革命与新科学》所直接关注的对象。在本卷的第三章中，沃格林讨论了维柯(Vico)的《新科学》，这一章总体上完成于1941年夏天，而这对维柯的讨论成为了一次契机。^① 沃格林对维柯的思考，以及对汤因比(Toynbee)《历史研究》的分析，最终换来了他有关“历史起源”(historiogenesis)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发展着，直到1974年，在《次序与历史》第六卷中，对这一思想的最终描述发表出来。^② 在讨论维柯那一章的末尾，沃格林所得出的结论，证明了他的名著《新的政治科学》的开篇词：“人在政治社会中的生存是历史性的生存；而如果一

① 1941年9月24日，沃格林致恩格尔-雅诺希(Friedrich Engel-Janosi)的信，沃格林档案，胡佛研究中心，斯坦福，箱11,7号文件。

② 《普世的时代》(*The Ecumenic Ag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974),第一章。

种政治理论能深入到本源中,它必然同时是一种历史理论。”^①《新的政治科学》更应该被当作 *hommage à Vico* [对维柯的敬意]来阅读,同时,无论怎么说,这些最先在本卷《政治观念史稿》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的论题,在随后的超过三十年时间中,成为了被广泛分析的主题。

早在 1943 年,沃格林就已经指出了“政治观念史”所处的固有的程序性或方法论语境。^② [2]这一年的 11 月,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研究委员会的政治理论小组成员在华盛顿开会,讨论当时的研究需要和成果。沃格林提交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随后以“政治理论和通史(general history)的模式”为题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③ 沃格林讨论了“政治观念通史”这个题目,而在已有的教科书中,邓宁(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麦基尔韦恩(Charles Howard McIlwain)、萨拜因(George H. Sabine)和库克(Thomas Ira Cook)都已提出了这个问题。^④ 提出“通史”的概念,沃格林是想要使这类著作区别于讨论单个作

- ① 《〈新的政治科学〉导言》(*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第一章。
- ② 在德国,某些社会科学“学派”之间曾发生了近半个世纪的争论,这些争论在 19 世纪 20 年代结束,沃格林的“方法论”这个术语,就与这些争论相关(见《新的政治科学》,页 10 以下)。所以,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必须小心。
- ③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 1944),页 746—754。沃格林的报告还被重印于格里菲思(Ernest S. Griffith)编的《政治科学研究》(*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8)页 190—201。本文中的引文出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版本。
- ④ 邓宁,《政治理论史,古代和中世纪》(*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Ancient and Medieval*, New York: Macmillan, 1902),《从路德到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Luther to Montesquieu*, New York: Macmillan, 1905),以及《从卢梭到斯宾塞的政治理论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Rousseau to Spencer*, New York: Macmillan, 1920);麦基尔韦恩,《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从希腊到中世纪晚期》(*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From the Greeks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转下页)

家或单一时期的专门性的专题论文,以及对诸如主权、权威、制宪政府等等这样的传统政治问题的分析。他说,一部“通史”所涵盖的课题,就范围而言,是国际性的,但是这种文体却“几乎是美国的专利”。^①此外,“政治观念通史”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实际上,它始于邓宁,邓宁把他自己的事业同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著作相区分,在邓宁看来,让内的权威著作《政治科学同伦理之关系的历史》(*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morale*)^②有局限性,而且过于狭隘了。

由于做出了许多这样的革新,相比于其构架而言邓宁的新科学更清楚其自身的主题是什么。1944年,当沃格林的报告首次发表,[3]对于这些问题的认同甚至比邓宁时候的还要少,而这只是过了一代人的时间。造成这种情况的有两个原因:首先,纯粹的历史证据大量增加,而这是学者必须掌握的;其次,对于如何理解历史的常规构架,人们做出了大量的修正。于是,沃格林写道,“历史科学的发展以某些方式影响了政治观念通史中那些更为独特的问题,对这些方式进行描述”是应该的。

如同其他研究知识史的史学家以及其他多数历史学家一样,研究政治观念的史家通常把历史发展比作一条直线,沿着这

(接上页注④)New York: Macmillan, 1932);萨拜因,《政治理论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37);库克,《从柏拉图到伯克的政治哲学》(*A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Plato to Burke*,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6)。

① 沃格林没有明确讨论为什么会是这样,然而,从《论美国的思想形式》中他对美国法学的分析,这一点非常明确,在此书中,沃格林本应发现一种实用且审慎的动机。见里奇(David M. Ricci),《政治科学的悲剧:政治学、治学与民主》(*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页67-69中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② 第三版,二卷(Paris: Lacan, 1887)。

一条直线，“人类”，这一蕴含和表述观念的现象，“穿越了古代、现代和中世纪各个历史时期，持续地演进着”。正如沃格林在本卷第一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只要我们停留在精神的视域中，同时认定基督教的精神普世主义就等于西方世界的历史视域，那么这一直线“观念”的神学源头在经验上就足够充分了。换句话说，只有当人们在良知中忽略了与西方历史平行发展的其他非西方的历史，或者始终对前古典的各种文明的历史一无所知，这种直线“观念”才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对于沃格林来说，这种观点在三百年以来一直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受到普遍质疑，直到黑格尔(Hegel)之后的那代人，平行发展的非西方历史和历史活动，才成为有实际意义的核心问题和欧洲人理论关注的焦点。^① 俄罗斯这支非欧洲的力量，在欧洲事务中所起到的实际性的重要作用，在维也纳会议以后就非常明显了。东方学家们的著作，把有关平行发展的近东和远东文明的新知识，再次带入公众的视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有关多种文明内在周期的著作，深刻地修正了常规的线性模式。

沃格林思考了政治史模式中的这些变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政治史同政治观念之间关系的问题。[4]他说，一种可能性在于政治观念史缺乏自身的形式和构架。如果是这样，所谓的政治观念史完全应该被理解成，相互连续的观点按时间罗列而成的一本百科全书。这样一种概括性的纲要，也会违反对历史最为

^① 在沃格林的《人文主义的帖木尔图景：政治神话诞生的研究》(“Das Timurbild der Humanisten; Eine Studie zur politischen Mythenbildung,” *Z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17, 1937, 页 544—545)的序文中，沃格林已经开始关注“平行发展的历史”。这篇文章被重印于《追忆：历史和政治理论》(*Anamnesis; Zur Theorie de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Munich: Piper, 1966), 页 153—178, 重印时，序文被删去。

简单的理解,也就是,历史是“一种具有意义的模式在时间中的展开”。在另一方面,让内认为,只有具有高度完整性的学说和“体系”才值得被思考,因为只有伟大的思想家才得到了那些可以被称为“科学”的成果,这一观点引出了这样的结论,通史的模式同政治观念史的模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① 第一种看法会使通史这整个事业变得毫无意义,人们可能会立刻打消这种想法。沃格林自己有著作论及帖木尔(Timur 或 Tamerlane)对西方政治观念的影响,还包括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有关救世主—君主的激发活动,他的著作也说明了,第二种结论是错误的。^② 真正的问题过去是,现在依然还是,如何以哲学的辩解方式对政治观念史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

在此背景下,显然邓宁要比让内有所进步,也就是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胜一筹:在他看来,“政治理论”指的是看法、观点和观念,“无论能否融入一个科学的体系,它都旨在解释统治者权威的起源、本质和范围”,他把“政治理论”区别于让内更为狭义、更为系统化的“政治科学”。邓宁随后在方法论上做出假设:“理论”之所以是有意义的,不是因为它是系统化的,或是科学性的,而是因为它“触及”了真实的政治史和现存的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政治观念史的模式应该从属于政治史的构架。但是,邓宁是一个进步论者(这与让内一样),在他看来,历史的方向是要将政治“与伦理的、神学的、法律的和和其他语境”相分

① 在当代政治科学中,第一种假设是由所谓剑桥学派的成员做出的,而第二种假设似乎影响了“施特劳斯主义者”的研究工作。

② 除了刚才提及的《帖木尔形象》那篇文章,有关细节问题可以参见《沃格林全集》卷22,《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2,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 IV,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ed. David Morse and William M. Thomps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8),页31—87论及马基雅维利的篇章。

离。在沃格林看来,这种观点最为严重的后果[5]就是,它略去了对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以色列历史的思考,即便“大量西方政治思想深植于”这一前希腊的背景中。

然而,这一方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除了中世纪后期教会与国家分裂这个问题以外,邓宁的解释方法迫使他排除大量中世纪的材料,只要它们与“政治史”无关。在沃格林看来,“只关注与我们的时代有着直接和广泛延续性的历史时期,如果与这一历史时期无关,就以其政治观念的结构与我们自己的不同,而将之略去,这种省略在科学方法的标准之下是不正当的”。通过放弃任何对历史进步的确信,这个简单的策略,萨拜因取得了卓越的进步,而沃格林原先打算写的“政治观念史”就是要与他的著名著作一较高下。萨拜因能这样对政治观念的结构进行描述,使其在历史中被揭示出来,要么是以科学的形式,要么是以“一种有关社群次序的未加区分的复合体的形式”,^①这种复合体包括了诸如伦理、法律和宗教这些成份。通过这一做法,萨拜因把历史材料组织成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是有关城邦的,第二是有关普世社群的,最后是有关民族国家的。“通过对这一方法论思想进行详述”,沃格林说:“有关诸多原理的问题可以不再讨论了”。坚信线性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进步论模式,最终被抛弃,同时,“政治理论史的构架无条件地从属于政治史的构架”。^②在

① [译按]未加区分:应为 undifferentiated,沃格林还用紧凑(compact)来表述类似的含义,沃格林认为在历史早期的一些符号中,其含义指向含混的体验,在其中,宗教、伦理和法律等因素混杂在一起,难以简单地加以分别。

②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萨拜因的“历史主义”受到了列奥·施特劳斯的批判。参见萨拜因,《什么是政治理论》(“What Is Political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s*, 1939, 页 2)以及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是什么? 以及其他研究》(*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9)第一章以及页 223—228。

沃格林看来,这一基础暂时可以说是充分的,在此基础上,他列举了“政治理论史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沃格林看来,这里涉及三个问题:(1)选择一种模式,正是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才能对材料进行组织;(2)在已被采纳的模式之上区分和融入新的材料;(3)对于那些同原有的组织方式类型不一致的新材料,要在对其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对模式进行修正。

[6]关于第一个问题,重要的不是忠实于由诸如汤因比、或者《剑桥古代史》或《剑桥中世纪史》的编辑们所阐发的观点,而是需要明白,我们需要对模式进行这样的选择,以使我们能从根本上对材料进行组织。第二则是通过发表政治理论和政治史领域的专门性研究,历史科学得到实际的发展。由此,“政治理论史家……拥有了诱人的机会,可以试着把两套知识系统结合起来。”在其他许多事情中间,“政治观念史”就成了沃格林长期不断的尝试,他要把两套“知识系统”结合在一起。

在给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报告中,沃格林指明了学者们要志力于研究的几个问题领域。本卷中涉及的材料与其中的两个问题尤为相关。第一,解释现有的政府权威,不是政治科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政府的重要性可能始终不会减弱,但是“在文明周期的开始时期,社群本质的问题,以及对其进行创造、界定和阐述的这些问题”,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同样,当“社群创立的政治神话”面临危机、瓦解和重生的时候,社群本质或社群意义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因此,把政治观念史融入政治历史的进程,会引出对“关于社群在神话中创立的观念,以及对有着广泛影响的、这些观念在神学上的衍生体”的解释。所以,就“观念”而言,相比于让内乃至邓宁眼中与他们各自准则相关的东西,政治科学家所必须思考的